

No.19

2019/07

佛門網出版

門送出

手藝人
雲水

鄭志康 要讓好願在人間！——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專訪

唐秀連 日本佛教的神道意識

王冰 不輸給雨——我想成為那樣的人

第二屆佛學基礎聞、思、修班

6月8日 蘊處界三科
6月15日 十二因緣
6月22日 因果道理
6月29日 因果範圍
講師：黎國權

7月6日 諸法釋義
7月13日 百法
7月20日 三法印
7月27日 佛教的倫理觀、三皈
講師：黃廣昌

8月3日 五戒和十善
8月10日 戒殺、放生、茹素
8月17日 戒定慧、戒律略釋
8月24日 修止觀法
講師：釋定培法師

8月31日 四聖諦法
講師：黎國權

上課時間：
逢星期六
晚上19:00至21:00

淨薈

2019年6月至8月
弘法系列

《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研習班

逢星期二 上午9:00-10:30

導師：釋弘願法師

靜坐共修

逢星期二 晚上19:00-21:00

念佛共修

逢星期五

誦《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晚上19:00-19:30

默念佛號共修 晚上19:30-21:00

生活禪系列

「禪修的方法」

6月16日星期日

晚上17:00-19:00

「假如世界到盡頭」

7月7日星期日

上午9:00-11:00

主講：釋常霖法師

素出零感冒零疾病

6月7日端午節公眾假期星期五

上午10:00-11:30

主講：盧麗愛醫生

免費提供台式八寶粥、

新鮮車厘茄和茶點

《妙法蓮華經》略說

6月28日、7月5,12,19,

26日、8月2日 逢星期五

上午9:00-11:00

念佛共修

8月9,16,23,30日 逢星期五

上午9:00-11:00

主講：釋道源法師

護生畫坊

8月25日星期日

晚上17:00-19:00

主講：張懿之

地址：香港元朗擊壤路17號順發樓三樓F-G室

電話：2476 7730

講座費用全免，免費提供輕盈茶點。電話、網上報名：

<http://www.purelandassembly.org/activity/2019/jun-aug.html>

或郵寄報名皆可。

贊助



陳廷驊
基金會
The D. H. Chen
Foundation

主辦

淨薈

The Pure Land Assembly

www.purelandassembly.org

編者語

法鼓山於2018年六月通過敦聘法鼓山副住持果暉法師擔任第六任方丈。果暉法師是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也是聖嚴法師2005年傳法的法子。法師出家三十多年來，在教團中，人格健全、戒行清淨、氣度恢弘、有大悲願；和眾領眾、廣結善緣；對於修持，道心堅固；對於聖嚴法師的理念宗旨，依教奉行，備受僧團及信眾肯定。最近方丈和尚來港，慈悲接受佛門網的訪問，和我們談教育人才、漢傳佛教的發展路向及如何發好願。

中國佛教是日本佛教的直接來源，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這並不意味日本佛教即是全盤漢化的佛教，也不應將日本佛教僅僅當作模仿中國佛教的變異體。故此，在考察日本佛教時，應避免墮進以中國佛教為本位的思考誤區。一個較為可取的做法，是將日本佛教視為日本宗教的一分子，置於日本信仰觀念的脈絡來理解，也就是循日本宗教文化的主體個性，來解讀日本佛教，如此將可更深入地解析日本佛教的本質和特色；而一些在人們眼中頗為特異的現象，諸如真俗一貫、戒律廢弛、重視咒術等，亦可從日本固有的宗教意識向度，獲得更恰當的說明。作者唐秀連博士今期為我們剖析日本佛教的神道意識。▣

一門超出

手藝人奚淞

目錄

- 04 明覺專訪 文：鄺志康
要讓好願在人間！——法鼓山方丈
和尚果暉法師專訪
- 11 佛學專論 文：唐秀連
日本佛教的神道意識
- 23 兒童圖畫書中的生命教育 文：王冰
不輸給雨——我想成為那樣的人
- 28 聲·色 文：陳耀紅
敦煌建窟人的初心與敦煌音樂研究
- 33 英語專稿 By Lyudmila Klasanova
Echoes of Indian Buddhist Culture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hashi Bala,
Part One
- 38 素食時代 文：說柏
「素食教養」 鄺梓罡發願推素，源自他和
慈濟的深厚因緣……
- 44 直指人心 文：傳燈法師
九十日以前



© 法鼓山 — 果暉法師

出版人：林國才
執行編輯：鄭志康
美術設計：Dechen Lodroe

出版：佛門網有限公司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
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6 室
(852) 2405 6328
enquiry@buddhistdoor.com
www.buddhistdoor.org

《一門超出》顧問（按筆劃排名）：

衍空法師	昭慧法師
海全法師	傳燈法師
僧徹法師	陳劍鏗教授
麥成輝先生	惲福龍校長
劉宇光教授	潘宗光教授

所有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一門超出》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護，未經出版人書面許可，任何圖文不得全部或局部轉載，翻譯或重印。

© Buddhistdoor All Rights Reserved.



法鼓山於 2018 年 6 月通過敦聘法鼓山副住持果暉法師擔任第六任方丈。果暉法師是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也是聖嚴法師 2005 年傳法的法子。法師出家三十多年來，在教團中，人格健全、戒行清淨、氣度恢弘、有大悲願；和眾領眾、廣結善緣。最近果暉法師來港，慈悲接受佛門網的訪問，法師曾任法鼓山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系主任、法鼓山僧團都監、法鼓山僧伽大學院長，教學資歷豐富，我們的話題，便從培育人才開始。

法鼓山的三大教育方針

聖嚴法師曾說：「今日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因此，法鼓山推動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以此三大教育延續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與悲願，透過人品的提昇，建設人間淨土。這是我所理解的法鼓山教育方針。「佛教的弘化，必須要有人才，學術研究與修證人才都需要。學術研究，有助於提昇佛教的形象和地位，但是對社會的影響，必須從實踐著手。法鼓山三大教育中的大普化和大關懷教育，重於實踐層面，大學院教育則為大普化和大關懷教育培植專才，三大教育都為整體佛教培養人才。」法師說。

法鼓山的大學院教育已近四十年，從早期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到現在的法鼓文理學院，開辦學士、碩士及博士班，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入讀。另

外法鼓山也設有僧伽大學，以現代化的教育體制，培養德學兼備、解行並重，具有高尚宗教情操，並能帶動社會淨化的僧才。

「聖嚴師父曾說：『佛教不是缺乏出家人，而是缺少實踐正法及具有大悲願心的出家人。』因此，我們培養學僧以道業與學業並重，從在學至畢業後領執，都是終身學習和奉獻的場域，在日常生活中鍛煉心志，是十分重要的。」誠如法師所言，法鼓山培養的研究人才和一般學院的方法不同。法鼓山不只傳遞和研究佛學知識，也要實踐佛法，讓學生除了深厚的學問，也能有健康的身心，和奉獻社會的菩提心，如此才不辜負十方大眾供養的用心和功德。

「現今的佛教出家人，除了要兼具理論和實修，語文能力也很重要。語文多元化，對於國際交流乃至弘化，均有幫助。三管齊下，我們自己言之有物，才能與各界、各宗教達成互惠的深度交流。」法師認為，不一定所有佛弟子都要讀博士，但我們

也不能消極坐等下一代大師出現。

「上上人才，往往是自我養成；透過現代化的教育體制，至少可培育出為量可觀的中上人才，使中上人才，也有機會成為上上人才。」

至於大普化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參與者能在課程及活動過程中體驗佛法，提昇自己的人品，影響周遭的社會環境。例子包括透過修行活動來淨化心靈：在禪修方面，有入門類的初級禪訓班，也有進階類的禪七、禪四十九、禪九十。在法會方面，則有大悲懺、地藏觀音法會、梁皇寶懺、水陸法會等，尤以結合環保、藝術等精神而改良的水陸法會，不但回歸佛陀本懷，並賦予了現代精神。此外，法鼓山也運用現代傳播媒介來普及佛法——出版各式叢書及影音產品，還透過電子、平面及電視媒體拉近與社會的距離。

人的一生，從初受孕即開始的胎教，到死亡時的臨終關懷及往生關懷之間，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層面，都是法鼓山關懷的焦點。在大關懷教

育中，法鼓山長期推動社會救助及臨終關懷。在社會救助方面，自2001年3月成立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後，擴大並提昇了關懷層面，無論是急難救助、慰訪關懷，都受到社會各界的信賴與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的「關懷生命專線」，專線自2009年啟用至今，秉持「心靈環保」理念，融合佛法觀念及心理學助人技巧，提供電話專線協談或面對面關懷服務。果暉法師表示，他們剛剛在四月為122名的義工舉辦授證儀式。隨著這些義工經歷共七個月的培訓後，專線也擴大了服務時間，從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九點至晚上九點，他們將手執聽筒，傾聽社會大眾的身心憂擾，讓需要協助的人士，也能練習佛法來調整觀念和人生方向，永不放棄，樂觀生活。

關懷社會，就公共議題發聲

明年是2020年，二十一世紀快過了五分之一，大眾對於在宗教層面上履行社會功能的期越來越殷切。在回應社會需求這方面，傳統佛教一向給人的印象是緩慢及抽離的。例如我

們甚少聽到佛教徒就戰爭、貧窮、不公義、女性受壓迫等公共議題發聲。相比之下基督教及天主教比我們走得更前、更快。對此，法師同意在現代的脈絡下，佛教應加強展現對社會的關懷和實踐。

「佛教參與社會的立場，可借釋迦牟尼佛悟道前後的歷程來說明。悉達多太子出家，經六年苦行成道，這段期間，斷離一切人際關係，而在悟道後返入人間，說法度眾四十九年。修解脫道、行菩薩道，即是佛教關心社會而又超越社會的體現。此外，佛教重視和平。真正的戰爭，不只是發生於國境之間或是族群對峙，而在我們內心的矛盾。那是一場個人自己的戰爭——執著、三毒、無明……因此跟其他宗教的處理方法相比，佛教採取的態度是回歸內外和平——以和平的方式促進和平。」

另一個大眾關注的議題是貧窮，法師點出貧窮分為物質貧窮和心靈貧窮。例如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為台灣內外重大災難提供物資援助，此外他們也對低收入戶、老人、殘障等弱勢團



體，提供長期的社區服務和慰問關懷。「物質的貧窮，可從社會福利制度來改善，有資源的人應當濟助弱勢者。但是一切貧窮始於心靈的匱乏，所以我們重視心靈環保，籲請人與人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彼此尊重，互敬互助，共同合作，從而消弭衝突，減少貧窮。」

不同國家對公義自有不同詮釋，然而佛教強調眾生平等的立場。法鼓山一直不定期與全球女性和平促進會（The Global Peace Initiative of Women）共同舉辦「全球女性慈悲論壇」及「青年領袖促進和平論壇」，期許以深度討論，引發大家在面對世界問題時生起大悲心，從而推動世界和平。例如在 2019 年 11 月，他們會在泰國合辦一場探討氣候變化的論壇。這些都顯示出

法鼓山在眾多社會議題上並沒有缺席。

佛門網以網絡傳遞資訊的形式弘法，而法鼓山在這方面也有許多新創建，如直播法會及共修，網上點燈、超渡等。科技發展的確為我們生活帶來便利性，除了讓我們更快速取得資訊外，也有助大家和社會產生互動。不過曾經有不少人指出，網絡的負面作用同樣會影響到佛教以網絡弘法的理念，最常見的問題包括抄襲及散播失實內容、資訊的碎片化及表面化、使用者誤以為網絡上的行為能取代現實生活等。

站在佛教徒的角度，法師提醒我們要注意發佈的資訊是否有益人心，是否會讓人心中生法喜；接收資訊時要謹慎過濾，畢竟網路是中

性工具，都是人心思惟的顯現。「媒體人要有責任感，不要只為報導而報導，造成社會困擾及人心不安。回到慈悲智慧的立場，發布訊息前想一想，是否正確、有益人心，且能幫助社會平安、快樂。」

近三十多年來，西方醫學和心理學界發展出多種以正念（Mindfulness）為基礎的修習方法。最常被使用的「正念」定義是麻省大學醫學院的卡巴金博士（Jon Kabat-Zinn）所說的「刻意的、不加評判的、針對當下的注意力」。在正念風氣盛行的今天，連很多佛教徒也參與其中，但當中不少活動未必完全和佛法有關，甚麼存有灰色地帶。在面對西方大力推廣正念的情況下，佛

教徒應如何作出取捨？又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法師指出，卡巴金博士本人有禪修的經歷，因此不懷疑他這位倡導者並非對佛法毫無了解。事實上，正念，是佛教於美國在地化之後，再向世界各地傳播，這是很正常的文化融合現象，自有它相應的對象。這點跟坊間現時大量出現的「XX禪」也差不多——巧克力禪、攝影禪、茶禪……雖然這些活動不真的能讓我們深入禪法，但若能幫助參加者放鬆、專注，不也很好嗎？當參加者自覺有需要參加高階一點的禪修課程時，他們自己會去嘗試了解。

「修學佛法的次第很重要，可歸納為聞思

修證，或是信解行證。信，從信仰入門，建立信心。解，清楚理解因果因緣觀。行是實踐。證是對實踐的檢視，對佛法有所體會，對人生有所受用，這也是證。以法鼓山為例，我們分設初、中、高階禪修課程，禪眾可逐級深入禪法，只要持之以恆，自然可找到相應法門，從修證建立真正的信心，從此對佛法不再動搖。」

在中國的語境中提到佛教，很自然是指漢傳佛教，然而原始佛教及藏傳佛教亦自有其生態圈在運作。身為佛弟子，理解不同宗派之間的差異，一直是近年經常探討的議題。2018年法鼓文化主辦「世界佛教村」座談會，集合了東西方的教界賢達，一同交流佛法弘化新思維，擘畫「世界佛教村」的美好景致。其時果暉法師提到我們要緊記「以利他來自利」，勉勵大眾珍惜感恩每一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在這次訪談中，我不忘請他就「視野」和「使命感」這兩個立足點，談談法鼓山在全球佛教的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更關心佛法調適身心的實用面向。但我們不要忘記，應用是建基於對佛法的正確理解。漢傳佛教發展至今日，歷代大德留下的論籍繁多，我們發揚這些珍貴的傳承是責無旁貸的。讓世界各地的佛教徒都能理解及受用漢傳佛教的優點，是我們的首要課題。」那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呢？法師補充，加強外語的學習，其一是為了要把祖師大德智慧傳播出去，因為外國群眾不懂得中文；其次是與各國學者分享漢傳佛教的豐富內涵。

好願在人間

聖嚴法師說過，發願是一種心態、一種生活態度，更可以說是生命的方向。現代人生活充滿迷茫和痛苦，發願有助我們尋找生命方向，在滾滾紅塵中產生堅定的信心，從而得到力量。剛巧2019年法鼓山的年度主題是「好願在人間」，這是由聖嚴法師留給社會大眾的勉勵，希望我們能透過許願、行願，來轉自己的好運，也轉家庭、社會及全世界的好運。

也許你我會問，如何發一個好願？法師認為，我們要以發大悲願為目標。「漢傳佛教強調成佛之前，必

須先行菩薩道。成佛是一段無量劫的修行過程，為此我們要堅持不懈怠、不退轉。做任何事，都會遇到挫折，而願心，既是起點，也是大方向，同時代表精進的意志力，提醒我們要朝著方向努力前進。」

法師指出，法鼓山是觀音道場，四個相應的修行次第是：念觀音、求觀音、學觀音、做觀音。念觀音，是念觀音菩薩的慈悲智慧功德；求觀音，是為眾生祈求，祈求佛菩薩讓自己有力量幫助眾生；學觀音，是學習觀音千處祈求千處現的精神，隨時隨地幫助他人；當我們的智慧慈悲一分分增長，能像觀音菩薩那樣，時時、處處濟助眾生，那就是做觀音。

我們雖然常說要發大願，法師卻認為，願「可大，可小」，不妨掌握「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兩個原則。誠如他在新春開示所教導那樣，一方面是願自己成長，另一方面是願關懷利他。這兩個方向相輔相成，其中一個有所增長的話，另外一個面向也會隨之提昇。

年紀較大的老菩薩，是否發的願也要比照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呢？法師建議我們不要有這種思維，每人都可以從小處著手。「不要吝惜發願，也不要發空願，認知自己的能力、體力和各方條件，是發好願的基礎。比如長者體力可能較弱，假使有心當義工也很好，可幫忙揀菜，或是整理蒲團、毛巾，能做多少是多少，不必強己所難。做義工，是從利他來消融自我執著，那才是真正的快樂。」

發願以後，不能就這樣扔到一旁，是要去實踐的。法師希望我們能夠經常提醒自己：「我願意這麼做！」那麼，即使遇到挫折困難，依然可以保持初心，鍥而不捨堅定前行，這便是願力的可貴。

最後，法師寄語大家，生命的意義，在於自利利他。我們與家人、與社會大眾的因緣是無法切割的，透過願力，可使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更緊密結合，互相影響，互相分享。如果大家都能發好願、行好願的話，那這個世界將會更美好！



脫胎換骨的日本佛教

佛教在日本之公傳，是在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濟王遣臣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尊，以及幡幢、經論，自此漢地佛教正式進入日本朝廷。由此可知，中國佛教是日本佛教的直接來源，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這並不意味日本佛教即是全盤漢化的佛教，也不應將日本佛教僅僅當作模仿中國佛教的變異體。對古代日本人來說，佛為「鄰國之神」，佛教是使用外國語言的宗教，無論是佛教還是漢語，都屬於從大陸輸入的異質文明，所以絕不可能在毫無語言障礙及文化隔閡的情況下，原封不動地一一因襲，而必然經過在地化的吸收與再創造過程。因此，日本佛教雖根源於中國佛教，但已經脫胎換骨，一方面保留了母體的一些輪廓，另一方面注入了日本民族濃厚的原始宗教意識，令其骨髓丕變，別立於漢地佛教之外，自成一系。

故此，在考察日本佛教時，應避免墮進以中國佛教為本位的思考誤區。一個較為可取的做法，是將日本佛教視為日本宗教的一分子，置於日本信仰觀念的脈絡來理解，也就是循日本宗教文化的主體個性，來解讀日本佛教，如此將可更深微地解析日本佛教的本質和特色；而一些在人們眼中頗為特異的現象，諸如真俗一貫、戒律廢弛、重視咒術等，亦可從日本固有的宗教意識向度，獲得更恰當的說明。

日本佛教的自我意識

也許在不少華語族群的印象中，日本佛教是奠基於隋唐佛教的產物，無論在教義上和形制上，幾近於中國佛教的複製品。不過這大概是中國人對日本佛教的刻板印象而已。作為外國宗教的受容者，日本僧眾卻由始至終感受到難以跨越的語言障礙。因為存在著語際理解的問題，日本接受佛教的經過，其實並不如人們想像般輕易和順遂。

在佛教最鼎盛的隋唐時代，入華日僧絡繹不絕，最澄、空海就是其中表表。可是他們一般留華的日子並不算長^①，而且雖能讀寫漢文，但聽講能力卻相當有限，好像最澄便帶同翻

譯前往中國，顯然是不通口語之故。平安時代入宋的杲然和寂照，據《宋史》記載，都是不諳華言，但憑筆劄交談。可想而知，他們未必能夠與中國學者暢所欲言地說法論道。由是觀之，他們受中國佛教的實際影響有多深？是否真能熟悉漢土佛教的要義？都是值得存疑的。

至於東渡日本的中国僧人，原來亦普遍不通日語。例如奈良時代的鑑真，在日本首次建立正式的戒律制度，由於這是屬於形制而非理論的傳授，較少牽涉複雜的思辨，根本毋須運用流利的日語。江戶時代，黃檗宗始祖隱元率領弟子三十餘人在長崎

登陸（1654年），唯因語言不通，習尚不同，與當地僧人頻生齟齬，數度興起歸國的念頭。

②

可見，由於語言溝通的障礙，日本僧人接觸漢地傳來的佛教教義，主要是透過閱讀漢文經典，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佛教學者，如南宋時來華的日本曹洞宗初祖道元，有機會親炙中土大德，參學論道，藉此習得中國佛教的義理。是故，日僧的佛學知識大多來自研讀漢文典籍。然而此等經籍既已離開了原生的土壤和語境，在流布他方後，它們所承載的中國佛學精神，因為難以被瞭解而泰半流失了，只好專注於文句語意的解讀。解讀的方法，自然是透過日本人的文化意識和

① 最澄是短期留學生（「還學生」），留華不滿一年，空海只有兩年。

② 渡辺昭宏：《日本の仏教》，頁19-20。東京：岩波新書，1971。



弘法大師 — 空海



傳教大師 — 最澄

思維方式來進行。可以想像，在這一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本地文化的主動篩選，在地化的創造性詮釋，甚至刻意的曲解誤讀，以迎合本土宗教觀念的情況。

從中日語言的根本差異，日本佛教徒意識到語言如何影響佛法的理解和發展，個別學者進而懷疑，傳播到漢土的佛教，與誕生於印度的佛教，大異其趣，可能已喪失佛法的真諦。為尋求印度佛教的真義，解決對中國佛教的疑惑，唐時已有日本僧人欲西行天竺求法，最著名的是真如法親王，他是平城天皇的第三皇子，早年削髮為僧，拜在密宗高僧空海的門下。西元 861 年，已屆耆年的親王，不畏艱險來唐，可是在長安逗留數年，依然無法獲得滿意的答案，於是決定親自前往印度。西元 864 年，他從廣州出海，其後音訊全無，傳說死於羅越（今馬來半島南部柔佛附近）。真如法親王之後，日本臨濟宗初祖榮西亦有意遠行印度。1187 年，他第二度入宋，打算取陸路前赴印度，可惜當時北方由金和西夏控制，西域的通路封閉，又不獲發從南海出航的通行証，最終未能成行。其後，尚有鎌倉時期中興華嚴宗的高弁，欲經長安西去印度，預計用五年時間抵達王舍城，後因重病而打消念頭。

在古代，大多數日本僧人對佛法都是不求甚解，不過，尚有少數治學認真的學者，嘗試突破漢文的桎梏，深究印度佛教的義理，其中一個進路，是研究梵文。江戶時代，佛教學術界展開了正規的梵文

研究，先導者是靈雲寺的淨嚴，鑽研法隆寺的貝葉經，著有《華梵對譯》、《悉曇三密鈔》；繼踵者有曇寂和慈雲尊者飲光，尤以飲光的成就，卓越非凡。他憑一己之力，將《般若理趣經》從漢文還譯為梵文；從1759年至1771年間，獨力完成《梵學津梁》一千卷，歸納出梵語的文法規則，較首部由梵語翻譯為歐洲語言的英譯《薄伽梵歌》(Charles Wilkins 翻譯，1785年出版)，還要早十多年，在梵語研究領域，開創世界的先河，堪稱日本近代佛教學的先驅。^③

從上可知，日本佛教與漢地佛教的關係，並不止於前者對後者的吸收和沿襲。日本民族在學習中國佛教的過程中，事實上也經歷了不少跟原生文化扞格不入

的情況。而且，他們還懷着批判精神和獨立思考，試圖為佛學研究另闢蹊徑。整體而言，日本人是採取自身的思想及信仰方式，來重構從漢土傳入的佛教，故日本佛教具有相當鮮明的自我意識。認為日本佛教學習唐朝佛教，即是依樣葫蘆的「全盤唐化」，這種說法並不確切。

神佛同體、神佛習合

那麼，日本佛教的自我意識到底表現在哪裏？要回答這個問題，便不得不談到神道——紮根於日本的風土，傳播於日本人之間的民族宗教。

神道信仰以小村落的自然宗教和氏族祭

祀為基礎，逐漸發展為一種民族宗教，迄今已有二千多年歷史。作為最原始的土生宗教，從古至今，神道深深地影響着日本文化的各個層面，塑造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深層心理結構，這包括他們不專奉一神的宗教意識。這種帶有深刻神道烙印的信仰心理，遍及日本本土與外來的宗教思想，從鄰邦輸入的佛教，亦自不例外。職是之故，日本雖然引進了大量佛教的物質文明、理論和規制，但是，日本佛教始終沒有徹底脫離神道的影響，不但崇佛並同時尊神，更藉着對神道的信仰和思維方式，來開展自我建構的歷程。這就是日本佛教中神佛習合，並行不悖的實態，與其他地方的佛教傳承相比，顯得別具特色。

③ 渡辺照宏：《日本の仏教》，頁25-28。

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外來文化最初被接受時，由於新事物無法被完全瞭解，因此往往被納入土著文化的一種既有形態來受容。好像佛教在中國的初傳階段，亦是寄生在方士圈，攀附黃老道，將佛比擬為西方的神仙，才容易讓中國人接受。日本人最初接觸佛教的情況亦大致相若，也是借助本土的神道作為容器來攝受佛教，具體而言，即在古老的神祇信仰基礎上將佛視為「蕃神」、「客神」或「佛神」，予以膜拜。儘管如此，中日佛教與本土神祇的關係，在後來卻呈現相異的發展路向。在中國，佛教經過二百餘年的經典翻譯及教理研習後，到南北朝時，已基本上停止對民間宗教、道教及儒、道哲學的依附，開始擁有獨立的宗教地位，亦正因為佛教不再是儒、道的附庸，才招致二教激烈的問難，引發三教的論爭。

然而在日本，神佛融通並不單單發生在佛教渡來的初始階段，而是在整個佛教歷史綿延不絕，未曾有過衰微的跡象。固然，神佛混同的現象，在印度和中國佛教，亦不罕見，不過這只出現在個別的歷史時期，並

非如日本的神佛一體信仰般，延續不斷。

從登上日本國土的一刻開始，佛教便注定跟神道結下不解之緣。欽明天皇在接觸到「周公、孔子尚不能知」的微妙佛法後，讚嘆不已，但國家應否接受佛教，他交由臣下議決，結果由崇佛派的蘇我氏勝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蘇我氏是將佛作為神明來接受，而不是廢棄氏神，改宗佛教，故此這是敬神崇佛的雙重信仰。至用明天皇，《日本書紀》稱他「信佛法，尊神道」，即用明天皇是既信仰外來佛教的同時又敬奉本國的神道，故實際上也是二教兼信，並沒有放棄神道，皈宗佛教。到推古天皇即位後，頒布「佛教興隆之詔」，表面上是偏向佛教，但她同時也下了「神祇祭祀之詔」，所以在骨子裏，仍然維持着雙重信仰的習性。^④

即使在其後的日本佛教發展過程中，也頻頻看到神道與佛教的高度融合。例如將奈良佛教流傳至今的東大寺裏，仍存在手向山八幡宮這樣的神社，它在東大寺的最高法會「修二會」等有着重要的功能。到了平安時

④ 白山芳太郎：〈神道與日本人的宗教心〉。崔世廣主編：《神道與日本文化》，頁120-12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期新興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依然極為尊崇神道。在天台宗的總本山延曆寺，從最初的山王七社依次增加至山王二十一社，以這樣的形式來舉行神道的祭祀。從平安中期至平安後期，真言宗對神道禊祓儀式中唱誦的祓詞，一直保持着虔敬的態度。在真言宗的總本山金剛峰寺，也供奉着丹生都姬神和高野明神。^⑤

除崇拜神明，奉行神道祭儀外，在鎌倉中期，兩派都發展出各自的神道說，將「本地垂迹」論進一步系統化。天台宗以山王神道說來展開自己的神道思想，真言宗則有兩部神道說。^⑥這時期的日本佛教，其實早已脫離依賴神道弘傳佛法的草創階段，不過她非但沒有刻意斷除與本土神教的關係，反而在佛教力量日趨強盛之際，加深與神道的連繫，以更成熟的理論模式，將「神佛同體」說完善化，以佛法合於神道，這不能不說是佛教界有意為之的主動抉擇。

本地垂迹

神道教和佛教得以糅合，需要一種黏合劑。扮演這個角色的，就是「本地垂迹」說，它是「神佛同體」最重要的理論基石，也是日本神佛融合觀的特色所在。^⑦



金剛界大日如來（根津美術館藏）



胎藏界大日如來

- ⑤ 白山芳太郎：〈神道與日本人的宗教心〉。崔世廣主編：《神道與日本文化》，頁 122。
- ⑥ 兩部神道中，伊勢內宮的祭神天照大神是胎藏界中的大日如來，伊勢外宮的豐宇氣毘賣神是金剛界的大日如來，伊勢神宮的內宮和外宮分別象徵金剛界和胎藏界。
- ⑦ 花山信勝：《日本佛教の特質》，頁 70。東京：岩波書店，1937。

「本地垂迹」是神道教和日本佛教的一種共說，目的在闡明神佛關係。「本地」是指佛的法身（或真身），「垂迹」是指佛隨時應機說法的化身（或應身）。本地與垂迹是本與末，實體與權現，根源與應化的關係。此思想源於《法華經》的「本門」、「迹門」，《大日經》的本地身、加持身，及大乘佛教廣泛主張的權化思想，原來旨在說明佛菩薩的本地身和應化垂迹，如中國禪宗便有寒山、拾得、布袋等為垂迹而來之說。天台宗傳入日本後，天台、真言諸宗開展了結合神道的「本地垂迹」理論，以佛為本地，神為垂迹，每一尊神均有一佛、菩薩與之搭配，諸神祇皆為佛、菩薩的應化垂迹。

如是「本地垂迹」說遂轉變為專述佛菩薩與神道神祇的對應關係的理論，從此，這個說法便主導了日本佛教的基調。

「本地垂迹」說的發端，不會遲過平安時代中期，^⑧但其思想內容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應佛教與神道勢力的強弱消長，在不同時期產生了特定的界說。根據學者辻善之助（1877—1955）的觀點，在白鳳時代（七世紀中後葉）便萌發神佛調和的跡象。奈良時期，形成「神悅佛法」，「神護佛法」、「神祇通過佛法求得解脫」的思想。平安中期至鎌倉時期，逐步確立佛主神從的「本地垂迹」說，神道被統攝於佛教的體系

內，僧人成為神社事務的主管。但是自十四世紀後，隨着神國思想的興起，陸續出現了反「本地垂迹」說——即批判佛主神從，堅持神主佛從的習合觀，這反映了神道價值的復興和反佛教意識的抬頭。

在佛教和神道的漫長競爭中，屢屢涉及神佛地位之諍，主要在究明兩者的關係是上下、主從、本末、先後，還是對等、並列、同格，其中有尊佛貶神之論，亦有崇神抑佛之議。相對於中國的三教論辯，多集中在義理上的優劣，鮮有牽涉神佛位格的高低，日本佛教與神道在本迹論上的主從之辯，在在說明這不只是一場神學的思想之旅，還關係到雙方在現實上

⑧ 「本地垂迹」說產生於奈良時代還是平安時代中期，是學界紛爭的焦點。見范景武：〈論「根葉花實說」及其思想影響〉，王寶平主編：《神道與日本文化》，頁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金剛界曼荼羅



胎藏界曼荼羅

的宗教地位問題，足見「本地垂迹」在日本人眼中，不只是一種宗教哲學，更是一種實質的信仰。^⑨而佛菩薩與神祇在位格上的差別，竟成為神佛習合觀的中心議題，此亦是日本佛教長久以來，雜糅着神祇信仰的明証。事實上，在神道教泛神靈觀念的大背景下，佛菩薩的威力有多大，能否鎮護國家，禳災賜福，從來都是人們崇信佛教的一個主要誘因。在佛教擁有優勢的年代，人們普遍認為，佛菩薩擁有無堅不摧的超自然能力，比起神祇的法力，更為強大，^⑩甚至是眾神明的本源，這無疑將以神力護佑國土的神祇，與佛

菩薩同歸一類，比量齊觀。此種「神佛同體」格局，流布甚廣，直至明治維新頒布「神佛分離令」（1868年），才被譜下休止符。不過神佛融和的觀念，千百年來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依舊保留着在家中同時安置神棚和佛壇，佛事和神道祭儀並行的習慣。在今天的日本社會，這種神佛習合的雙重信仰形態，還是觸目可見。

根據日本文化廳每年實施的《宗教統計調查》，截至2017年12月31日，日本神道教信徒有86,166,133人，佛教信徒有85,333,050人，

共計171,499,183人，^⑪比1.268億的日本總人口還要多出35%，推斷一人信仰兩教者，多不勝數。

神道的原理

有學者認為，通過佛主神從的觀念，促成神道與佛教的會通、結合，代表着古代神道被逐步納入佛教體系中，有利於維護佛教在思想文化界的支配地位。^⑫以上觀點，睽諸日本佛教的整體發展趨向，在某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蓋漢地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能在固有文明的挑戰中站穩陣

⑨ 花山信勝：《日本佛教的特質》，頁71。

⑩ 例如，《三代實錄》貞觀元年(859)八月二十八日條：「惠亮言：皇覺導物，且實且權，大士垂迹，或王或神，故聖王治國，必賴神明之冥助，神道剪累，只憑調御之慧刃。」這表示，天皇治理國家時，必須仰仗天神地祇的力量。「神道剪累，只憑調御之慧刃」，即是只有憑藉佛陀的力量，才可斷除眾神的煩惱，說明佛陀的威力，較神祇更為強大，是天皇治國所須倚仗者。見註8范氏論文，頁5-6。

⑪ 日本文化廳宗教統計調查：http://www.bunka.go.jp/tokei_hakusho_shuppan/tokeichosa/shumu/index.html (2019年4月21日)

⑫ 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新版）》，〈序〉頁5及第二章頁16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腳，且在相當長時間內反客為主，改變了神道教的面貌，這不能不說是佛教進入日本後取得的偉大成就。但從另一角度看，在漢土發展圓熟的大乘佛教，在登陸日本後，便一直與神道保持着緊密的融合關係，因而走上神佛習合、真俗不分、注重咒術、形式主義的發展道路，與中國佛教的原來形態，大相逕庭，這正正表明，佛教在日本已經歷了長年累月的神道化整合過程。

再者，在主張佛主神從的「本地垂迹」說相當普及的平安末期至鎌倉時期，神祇信仰非但沒有被削弱，向神明祈求死後救濟的風氣反而更加盛行，可見在表面上，此時期的神道是退居次席，但實際上，神道勢力因着「本地垂迹」說之風靡，反為更加壯大。所以，認為佛主神從的「本地垂迹」論會為佛教帶來絕對的優勢，引致神道勢力消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毋寧說，這種「本地垂迹」論既有助佛教融入日本社會，亦滋長了神道，令佛教和神道，相得益彰。不過歸根究柢，神佛調和、「本地垂迹」是宣說神佛同源，佛菩薩也屬於神明的族類，可知它所彰顯的，其實是一種神道原則。在這個原則下，不單神道獲得自我鞏固和自我滋養的機會，也讓外來的佛教演變為神道予以認同及整合的本土宗教。

作為日本文化潛在意志的神道，不但左右着佛教的發展路向，還規範了日本文化的基本性格，這也反映到日本人接受外來文化的態度上。有學者表示，一般認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多借用外來文化的民族，但換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日本人比起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借用他國的文化。因為在日本人的意

識中，強烈地保留了甚麼是固有文化，甚麼是受容（借用）文化的記憶，兩者清晰分明，不相混淆。

⑬ 所以他們吸取異域文化，很多時只是給外來的東西賦予日本文化的原理，也就是神道的原理，換言之，將外來的文明改頭換面，然後以神道的方式呈現出來。是故，在與他國文明接觸時，神道就恰如經常換穿衣裳的偶人，隨着時勢的轉變不停變更自己的裝扮，但其基本原理卻頑強地保留下來。在外來文化勢力強勁時，她會改變自己的打扮，但一旦風頭過後，又會以新的形式恢復自己的勢力。⑭ 可見神道的隨機應變性十分突出，生命力非常強固，這在日本佛教身上，可以清楚地體現出來。

總的來說，因為佛教在明治維新前，多數居於較強勢的位置，遂令神道受到佛教廣泛的滲透。但是，佛教帶來的刺激並沒有引致神道文化的斷絕，反之，它是促使神道自我完善的重大動力。在與佛教的博奕中，神道一邊自我調適，一邊吸收對方的養分，不斷成長而延續着自身的文化基因。同時，她又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規則，改造了中國佛教的內在精神和外在表現，令外來的佛教蛻變為具有濃厚現世主義傾向的在地化宗教。職是之故，日本佛教的發展軌跡離不開神道原理的制約，導致她蘊涵着深厚的神道意識。若要深入日本佛教的思想和特質，就不能忽視在其身上經年累稔的神道教積澱。❶

⑬ 崔世廣：〈神道與日本文化的性格〉，崔世廣主編：《神道與日本文化》，頁 1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⑭ 石田一良：《日本文化——歷史的展開與特徵》，許極熾譯，頁 271。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9。



《不輸給雨》宮澤賢治

不輸給雨 不輸給風

不輸給雪

也不輸給夏天的炎熱

保有強健的身體

不受慾望控制

絕不發怒

總是靜靜的笑著

一天吃四合的糙米

和味噌和少許的蔬菜

所有的事 不考慮自己的好處

多聽多看多了解

然後不要忘記

住在野地松林蔭下的小茅屋

東邊如有生病的孩子

就去看顧

西邊如有疲累的母親

就去幫她扛稻束

南邊如有將死的人

就去告訴他不要害怕

北邊如有吵架或興訟

就去告訴他們別再為無聊的事
爭執

乾旱時流下眼淚

在寒冷的夏日不安的踱步

大家都叫我木頭

不被稱讚

也不給人添麻煩

我想成為 那樣的人 ⑭

我想成為那樣的人：賢治的人生
態度與信念

《不輸給雨》（雨ニモマケズ，中文譯名常作《不畏風雨》）是日本國民詩人與兒童文學巨匠宮澤賢治（1896－1933）最廣為人知的詩作，是他離世前兩年在病榻上寫就，生前未曾發表，弟弟收拾遺物時，在他的一本筆記中發現了這首詩。

在詩中，宮澤賢治以極為簡單的文句，看似平常地道出他所堅持的人生態度與信念，也為令眾人疑惑的人生問題提供了他的答案：

如何面對外在不斷變化的條件
與環境？

——直面風雨，無所畏懼。

如何照顧我們的身心？

——強健身體，節制慾望，保持內心的平和與寧靜。

⑭ 這首詩有多種中譯，此處選用了台灣繪本譯者林真美的譯本。簡體版繪本由大陸獨立音樂人、詞作者程壁翻譯。兩個譯本各有千秋，程壁的翻譯頗具詩意與民謠風，林真美的翻譯則更貼近孩童的語言。

「我想成為 那樣的人」——宮澤賢治的詩句流傳百年，為後世人留下啟示與思考。

——飲食與居住簡單，過簡樸自然的生活。

短暫與不朽：宮澤賢治的人生

——不考慮自己的好處，不計較個人得失，多去了解、觀察與聆聽，並銘記在心里。

如何處事？

——盡自己所能，幫助他人，培養慈悲心與同理心。例如：看顧有需要的病人，幫助自己的親人，安撫面對死亡恐懼的臨終者，調解異見與爭拗等等。

要做一個怎樣的人？

——既不需要被稱讚，也不會給他人添麻煩。

宮澤賢治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昭和時期的詩人，他勤於寫作，在短短的一生中共創作了九十七篇童話和一千多首詩歌，而生前他卻汲汲無名，僅自費出版過詩集《春與修羅》及童話集《要求特別多的餐廳》（又譯作《花樣翻新的飯店》）兩本書，唯一收到稿費的只有一篇刊登於雜誌《愛國婦人》上的童話「渡過雪原」。

宮澤賢治一生艱辛潦倒，三十七歲便因病撒手塵寰，身後遺下

大批手稿。他在艱難歲月以及病床上寫下的短歌、詩作與童話作品，在其離世後方逐漸引起世人關注，終致廣為流傳。其最為著名的童話除《要求特別多的餐廳》，還有《銀河鐵道之夜》、《風又三郎》等作品，後兩部童話近年亦被改編為動畫電影。他的童話與詩作亦被收錄於日本小學、國中的國語課本。2000年，日本《朝日新聞》曾做過一項調查「日本千年以來影響最大的作家」，由讀者自由投票選出，宮澤賢治位列第四。二十世紀著名詩人中原中也（1907-1937），當代詩人與劇作家谷川俊太郎（1931-），漫畫家、動畫導演宮崎駿（1941-）均稱其作品對自己的創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這個不美好的世上，最美好的童話總是悲傷的。它們都是用飽受自我犧牲的崇高與孤獨所折磨的靈魂寫成的，滿溢著無邊的哀傷感，透明而悽美，原原本本的呈現出生命本身的重量。」宮澤賢治此句名言也成為他一生的寫照。生命雖然短暫，他卻為後世留下不朽的文學作品。

除了寫作之外，宮澤賢治也熱愛與從事農耕工作。他早年畢業於盛岡高等農林學校，曾經在農校教書，並創立羅須地人協會，他致力改造土壤與地質，以改善當地的耕種環境。他的作品因此傳遞出對農耕與大自然的熱愛，對生態的關注，以及對生命的感悟。宮澤賢治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從小受家庭影響接觸佛教故事與經典，一生信奉《法華經》。對佛教有所認識的讀者，當能體會到詩中所呈現的也正是一個佛教修行者恪守的人生準則。

值得收藏的現代繪本

依宮澤賢治的詩創作而成的現代繪本《不輸給雨》（雨二モマケズ，Rain Won't 日文版附英譯）初版於2013年，其圖畫作者為現任東

京藝術大學研究所教授、知名動畫製作人及插畫家山村浩二。在這本書中，浩二以極為豐富的生物繪圖方式，細膩描繪飛鳥、昆蟲、植物、樹木、農田與茅舍……呈現自然生態與田園生活的景象。詩中的「我」在圖畫中是一個帶著帽子、斜背著跨包的青年形象。這個「我」每次出現在畫面上都是小小的，讀者需要仔細尋找才能發現。小小的「我」有時獨自一人在風雨中行走，有時在小山坡上眺望農田；有時在辛勤勞作，有時在獨自思索。直至繪本最後一頁，畫面以「我」的視角向下望去，看見自己的一雙腿和在地上映出的身影。這雙腿大大的，雙腳踩在布滿落葉與枯枝的土地上，連同那個巨大的影子，佔據了最後一個跨頁的中心，表達出「我想成為那樣的人」的堅定與決心。

與這個小小的「我」形成強烈對比的還有圖畫中的昆蟲、飛鳥等自然界生物，它們的比例被刻意放大，甚至超過了圖畫中的「我」。這也在暗示與提醒人類應保持謙卑，了知自己的渺小，尊重自然萬物。在很多圖畫細節的處理上，繪者頗具匠心，讀者需要細細研讀，方能體會個中的深刻寓意。

詩作的英文譯者、旅日美籍詩人亞瑟·比納德（Arthur Binard）在繪本後記中寫到：「在創作這本書時，山村浩二和我試圖『在插畫中表現出那些顯而易見的事物』。這些畫面呈現了一種對賢治來說無須言說的生活，以及視而可見的生態系統。在將這首詩翻譯成英文時，我被他的現代性打動，也因而想起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話：『文學的新意乃是持久的新意。』即便《不輸給雨》與現在有距離，但問題不在詩本身，而在我們所處的這個無法再生、不得永續的時代。」

另外，成人讀者需要留意的是，由於詩作本身並非專為兒童創作，小讀者在閱讀時不容易完全理解詩作所蘊含的深意。盡管如此，在成人的伴讀下，小讀者仍然可以體會到詩句中傳遞出不畏風雨的堅定、信心與力量。在閱讀圖畫部分，細心的小讀者還能找尋到容易被成人讀者忽略的各種細節，領會圖畫中描繪天地、農田、植物、昆蟲等自然界的另一種風光。

《不輸給雨》，這是一本值得收藏的繪本。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在我們的人生有所經歷之後，不妨一讀再讀，你會有新的感悟與發現。❶



宮澤賢治





敦煌建窟人的初心與敦煌音樂研究

「敦煌的飛天非常漂亮，但最漂亮的還是建窟人的初心。」上月去看甘肅省文化和旅遊廳主辦的「絕色敦煌之夜」，最感動我的，就是擔任講述人的馬鼎盛所說的這句話。

敦煌是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而且處於絲路上，充滿浪漫又神秘的色彩，所以，即使是一些對傳統中華文化相當冷感的香港人，敦煌也不是個陌生的名字。但是，我們這些人當中，有多少會想一想，為甚麼自公元四世紀以來的一千年間，不斷有人跑到這個「終年吹著被稱為『黑風』的沙暴」（見《敦煌的色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地區，開鑿石窟、雕塑佛菩薩及高僧像、繪畫壁畫，和抄寫經卷呢？

有關敦煌最早開鑿的歷史，現在還可見得到的，是唐朝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的記載。據這碑上載，開鑿石窟始於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沙門樂傳見到三危山宛如千佛現身的金光，於是在此建窟。

上世紀五十年代，常書鴻跟畫家葉淺予一起也見過這景象，據常先生說，葉淺予當時驚嘆：那些山頂仿如文殊靜坐。

不過，金光瞬間即逝。常書鴻的兒子也經常在那山上畫畫，他也遇到過千佛般的金光，想立刻拿相機拍下，卻已經來不及。

樂傳和尚之後，跟著是法良和尚在敦煌鑿窟。不過，除僧人外，參與開鑿石窟的還有石匠和畫工。在莫高窟北部，現在還留下繪畫壁畫的無名畫家居住的洞窟群。據常書鴻說，這些「畫工洞」內高度很低，正常人難以站立，畫家們生活極艱苦，他們應該是整天蹲著或俯臥著作畫；而且，文獻有載，開掘洞窟的石匠和畫家們因貧困，不得不將孩子作抵押，借錢過活。

池田大作聽到常先生這樣說，深感痛心，並對這些石匠與畫工為甚麼在如此艱苦的生活環境中還能留下為數眾多的石窟，有這樣的感觸：「在成就這些事業的背後，不難想像，一定有著他們對於永恆存在的信仰，也就是對佛

教的虔誠信仰心，成為畫工們的精神支柱。」

我們到敦煌旅遊，又或在欣賞洞窟裏的雕塑與壁畫時，有沒有感恩這些僧人、無名藝術家，以及施主呢？

如果是佛教徒的話，來到敦煌，又是否會額外地帶著朝聖和禮拜的虔敬心呢？

面對敦煌莫高窟，讓人感興趣的，除了以視覺為主的建築和壁畫、雕塑外，當然還有現已收藏在各國博物館裏的經卷，以及音樂、舞蹈，和曲詞詩歌等文獻；此外，有關的歷史也非常引人入勝……

對這些感興趣的，除了佛教徒、旅行家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專家們。由於敦煌留下的文化遺產範圍非常廣闊，

數量也非常多，於是形成了「敦煌學」。

「敦煌學」中，有一個與音樂有關，研究敦煌古譜的部分，當中核心的課題，是如何破譯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的三個經卷及文卷背後的手抄樂譜，編號分別是 P3808、P3539 和 P3719。P 代表這些是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 — 1945) 從敦煌帶來的藏品。其中，專家們以 P3808 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這是三個卷子中，樂譜最多最完整的一個。

P3808 卷子背面有二十五個樂譜（這所謂前面、背面，只是一般人的觀感。按饒宗頤教授的研究，這卷子是先有樂譜，然後有人把這些抄有樂譜的紙張黏貼成一長卷，把講經文抄在上面），正面抄的是《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背面抄的二十五首樂曲按前後次序是：《品弄》、《□弄》、《傾杯樂》、《又慢曲子》、《急曲子》、《又曲子》、《又慢曲子》、《急曲子》、《又慢曲子》、《傾杯樂》、《又慢曲子西江月》、《又慢曲子》、《慢曲子心事》、《又慢曲子伊州》、《又急曲子》、《水鼓子》、《急胡相問》、《長

沙女引》、《撒金沙》、《營富》、《伊州》，和《水鼓子》。其中，第二首殘破，曲名只剩下一個「弄」字；另外，第十一首和第二十一首的曲名佚失。這張經卷由十一張紙粘成三米多長的長卷。最早對這些譜子做研究的是日本音樂學學者林謙三 (Kenzo Hayashi, 1899 — 1976)，他在 1930 年代已開始研究這些譜子，並在 1938 年發表了《琵琶古譜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譜試解》，並在 1940 年發表《國寶五弦譜及其解讀端緒》（「天平」和「五弦譜」是日本收藏的古譜），但當時他只譯出七首樂譜。到了 1955 年，林謙三才發表了全部二十五譜的破譯，並以英文出版了論文；後來，他在 1957 年又發表修正，名為《敦煌琵琶譜的解讀研究》，由曾經留學日本的中國學者潘懷素 (1894 — 1978) 把之譯成中文。1969 年，林先生再一次對文章及譯譜作修訂，編入他著作的《雅樂——古樂譜的解讀》一書中。

在中國，最早注意到敦煌樂譜的是版本學家王重民 (1903 — 1975) 和詞曲學家任二北 (1897 — 1991)。其中，任二北於 1954 年發表的《敦煌曲初探》，對後來的學者

出版的《敦煌琵琶譜論文集》。

也有很大的影響。此外，饒宗頤亦在1960年發表了《敦煌琵琶譜讀記》，1962年發表《敦煌舞譜校譯》，並在1965—1966年間跑去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巴黎及倫敦所藏的敦煌資料，寫成《敦煌曲》一書，1971年由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完成法文翻譯部分，以中法合本形式出版。饒教授又在1996年出版了《敦煌曲續論》。在此之前，他還寫了《敦煌琵琶譜〈浣溪沙〉殘譜研究》（即P3719）、《敦煌琵琶譜與舞譜之關係》、《敦煌琵琶譜寫卷原本之考察》，和《敦煌琵琶譜史事的來龍去脈》等，這些考釋及論文收入在1990年由饒教授自己主編出版的《敦煌琵琶譜》及1991年他主編

此外，較受矚目的還有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葉棟（1930—1989）在1982年於《音樂藝術》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敦煌曲譜研究》及把原譜破譯成現代的五線譜，當時，同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多位學者和音樂家亦紛紛對這些研究作出檢驗，應有勤、林友仁、孫克仁和夏飛雲還寫了《驗證〈敦煌曲譜〉為唐琵琶譜》。不過，葉棟的解構亦受到不少質疑，包括饒宗頤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創館館長張世彬在內。

但不管怎樣，上海音樂學院仍是中國研究敦煌樂譜的重鎮。該學院的音樂學者陳應時（1933—）在前人的破



P.3808 背《敦煌曲譜·急胡相問》

譯基礎上，加上從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和南宋張炎《詞源》等古文獻中得到靈感，以沈括所述「掣聲」與張炎記述的「拍」等有關理論，歸納為「掣拍說」，於是，亦重譯了這二十五首樂譜。2005年出版的《敦煌樂譜解譯辨證》，是陳教授把自己從1982年以來的研究作一總結。今年5月，上海音樂學院用陳教授的翻譯，改編演出。

敦煌學可以說是國際上漢學研究中的顯學，其中，敦煌的樂舞曲詞在過去一百年來，一直都是東西學者的興趣所在。最早期而廣為人知的西方學者，有英國學者畢銓（L.E.R. Picken, 1909 — 2007），他本來是一位動物學家，因李約瑟之邀而到重慶工作，遇到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 1910 — 1967），從而認識了一些中國古琴家，對中國文化生起濃厚興趣，1945年從中國返劍橋後，開始從事中國古代音樂的研究。

以上握要地介紹了一下敦煌音樂在上世紀初離開了母體（石窟），進入世界視野後，受關注的一些角度。其實，面對敦煌樂舞的研究，最困難的不只是像「天書」一樣的樂譜，還有它的來龍去脈，更是無法確定。雖然有人試圖找尋這些樂譜的真正來源，但證據都不充分。

傳統音樂是數千年中華文化流失得最厲害的其中一個環節。今天我們聽到的中國音樂，除了古琴音樂、部分的戲曲，與正急速消失中的遍遠地區的民間音樂外，其他的都是近這一百年來的產物。上述敦煌古樂種種不同版本的破譯，雖然亦曾多次被搬演，但真實的原貌至今都沒有定案。這都是十分可惜的事。不過，這亦正印證了世事無常，在地球這個有漏的娑婆世界中，即使是佛教聖地與事物亦須依靠因果緣起而生滅。佛教在漢末傳入，敦煌隨著佛教的宗教情懷的增長而日興，至唐代達到高峰期後，宋元時期逐漸衰微，這些現象，是否亦有助我們對中國佛教史的探討？

Echoes of Indian Buddhist Culture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hashi Bala, Part One

The eminent Indian scholar Prof. Dr. Shashi Bala is a specialist in Buddhist arts and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among Asian countries, and a disciple of the most renowned Buddhist scholar in India, Prof. Dr. Lokesh Chandra. She has 45 years of research experience, exploring, documenting, and traveling widely, delivering lectures and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She is also a dean of the Center of Indology at the Bharatiya Vidya Bhavan—an internationally reputed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India.

Recently Prof. Shashi Bala delivered a series of lectures dedicated to Buddhist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t several Indian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Indian National Trust for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Buddhistdoor Global spoke with Prof. Shashi Bala about the ancient Buddhists link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rof. Shashi Bala a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mage courtesy of Prof. Shashi Bala

Buddhistdoor Global: How did you begin exploring the Buddhist cultural tie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rof. Shashi Bala: It all happened when I was doing my master's degree in Sanskrit linguistics. There was a professor from Japan, Prof. Chikyo Yamamoto, curator at the Reihokan Museum in Koyasan, who came to India to study at the National Museum. He and his wife stayed at Prof. Lokesh Chandra's home, where I was also working. His wife wrote the

Ushnisha Vijaya Dharani with a brush on rice paper and I was so fascinated by the Sanskrit dharani*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first Chinese document I worked on was an inscription from 67 CE that tell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Indo-Chinese relations, when two Sanskrit scholars carrying Buddhist sutras, Kashyap Matang and Dharmaraksha, reached China on white horses. That

inscription existed in China and the estampage was brought by the father of Prof. Lokesh Chandra, the famous Sanskrit scholar, linguist, and politician Prof. Dr. Raghu Vira.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the inscription is in Chinese. I had never studied Chinese, but Prof. Lokesh Chandra gave me some training to rea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use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with that help I started working on the inscriptions.

Then I wrote a biography of Prof. Raghu Vira, who visited China as a state guest, invited by Premier Zhou Enlai. He collected a lot of relics of Indo-Chinese links and wrote a travelogue.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to read that. It was from his book that I came to know for the first time about the Dunhuang Caves and the beauty of th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there. I was looking at the images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nd started working on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lso at that time, I came to know about the

Gayatri Mantra that most Indians normally chant, discovered by Prof. Raghu Vira in China, written in four different scripts: Chinese, Mongol, Tibetan, and Uyghur.

During my college days, with the help of family and friends, I organized an exhibition on Ind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India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We showed quite a few 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from China.

BDG: What is your impression of contemporary Buddhist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SB: I would say that India and China have shared a deeply rooted culture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The roots are so deep and the branches are high and innumerable. You can look at different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ee the deep impact of Indian culture. Before Buddhism reached China, most Chinese emperors liked to build tombs, but once Buddhism arrived their energy turned more

toward building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The shift resulted in unparalleled abodes for the divine. There are monasteries, temples, and cave complexes.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can we find that scale of building.

We Indians are indebted because the Chinese have preserved a rich literary treasure, including texts that are lost in India forever but are still found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Also, Xinjiang is now a part of China and the Silk Road has preserved immense materials and cultural relics. Many archeologists and explorers have excavated and preserved them in different collections in countries such as England, France, Germany, India, Japan, and Russia. Whenever I go to China, I visit museums,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and I meet people and observe keenly how they offer prayers at the monasteries, chant sutras, and bow to buddhas. Their gestures of devotion reflect the deep-

rooted friendship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Wherever there are Buddhist statues and paintings in monasteries or temples, they are symbols of friendship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When I meet Chinese people, I feel warm and close. All of my Chinese friends respect India because it is the land of the Buddha. Scholars in China are working meticulously on their herita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is their own culture that we have shared over 2,000 years.

BDG: Wha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scovery for you during your numerous visits to Chinese Buddhist heritage sites?

PSB: Many things fascinated me.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e Sanskrit mantra Ushnisha Vijaya Dharani written 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lthough I had seen the enstampage in India, it was inspiring to see it on the Great Wall. Only

last year I had the chance to visit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and I could see wonderful collections of Buddhist statues. They have been so well preserved over the centuries and venerated by the great emperors of China. The Kizil, Bezeklik, and Dunhuang caves are true wonders of Asia. The thought of the people with devotion in their hearts and talent in their hands who created that unbelievable treasure is mesmerizing. This fascination inspired me so at Dunhuang to write a short poem. A few lines from that poem, addressing my friend, are:

Look at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How they look at you!
The dreamy posture,
The beautiful colors,
The draperies diaphanous.
The goddesses fly bringing

Flowers from heaven, flowers,
Fruits and incense
To offer to the buddhas

To me it looked like a miracle. I could see many Sanskrit inscriptions in many types of handwriting. In the Bezeklik Caves the Uyghur kings have written donor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So much is ruined, but still whatever has been preserved are immortal signatures of a deep friendship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at will continue for centuries to come. 🏠



「素食教煮」鄺梓罡發願推素，
源自他和慈濟的深厚因緣……

「人生茫茫，浮沉無際大海中，任由風浪漂浮；

立願覺悟，尋思宇宙真理海，從此解脫業力……」

這是慈濟歌曲《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的歌詞節錄，內容取自證嚴上人開示，描寫慈濟人心中那份發願心。

外號「素食教煮」的鄺梓罡（Ken Kwong），當年就是參加過慈濟的慈悲三昧水懺演繹、聽到這首歌後深感共鳴，因此發願茹素及推素，踏上他的素善人生之路。

這一切因緣，得由 Ken 從小已愛「揸鑊煎」的興趣說起。

因緣：從小愛下廚、做義工

「細細個，我已很嚟嘴，自然喜歡下廚！」Ken 的婆婆經營大牌檔，小時候他常前往幫忙。熱愛烹飪的種籽，就在小小一個牌檔廚房內，慢慢發芽成長，亦令他萌生開設 Cafe 餐室的夢想。

除了愛吃，Ken 另一興趣是做義工。曾學習空手道的他，唸書時已擔任導師，義教小朋友；亦曾擔任小童群益會義工。當年一次因緣際會下，Ken 來

到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參訪。「那時候是農曆七月，即佛教的吉祥月，慈濟的師兄師姊正忙於供齋。我十分記得，那些供齋的素菜賣相很漂亮、很吸引！」Ken 決定自薦擔任志工，幫忙煮香積。「一開始，我對佛教的認識是零。後來參與了很多慈濟活動，亦加入了慈青，漸漸對佛法，以至素食有更多了解。」

感恩：慈濟師姊安排赴台 學廚藝

開設 Cafe 的想法，一直藏在 Ken 的心中。自接觸素食後，他更想到不如將素食和 Cafe 合二為一，經營一間綠色素食 Cafe。「慈濟師姊知道我想開素食餐廳，提議不如前往台灣學師，她可幫忙安排。」Ken 抱著無可無不可的心態答應，卻料不到短短兩星期後便獲回覆，可在台灣一間素食餐廳出任學徒。「沒想過那麼快便可成行，一時間未有心理準備。但那時我已差不多大學畢業，既有時間也有空間，細想之下，決定前往台灣一試，邊做邊學。」



鄭梓罡（Ken Kwong）當年參加過慈濟的慈悲三昧水懺後，發願茹素及推廣素食，多年來一直沒有變過，而且越做越好。

發願：明白因果，祈由素食做起

Ken 坦言當日這個決定，純粹希望出外見識及學廚藝。結果，他越學越起勁。「餐廳起初以為我只會逗留兩、三個月，最終我在台灣足足學滿一年師！」學成回港後，順理成章加入素食餐廳工作，其時也有機會參與了慈濟的慈悲三昧水懺演繹。「三昧水懺，是希望我們明白因果、作出懺悔。」Ken 想到證嚴上人一直鼓勵大眾多吃素食，「來不及了！大家要素食救地球！」上人的叮嚀，啟發他從素食看到因果。「吃肉，其實是吃動物屍體，最終得由自己承受因果。」他感受到自己和慈濟一路走來的深厚因緣，決定發願推動素食。

「推動素食，首要條件是自己先茹素，這樣才有說服力！」Ken 自言是一個全情投入、一做便做到底的人。當立下決心茹素，便馬上戒吃葷食，再沒有一刻想過吃肉。「我相信這是發願的動力，令我『轉素』過程完全沒有難度。」

推素：設計創意菜式，打破沉悶傳統

在飲食業發展的 Ken，這數年來一直潛心發揮自己的烹飪才華，初入行時由低做起，到成為素食餐廳的創意主廚及產品研發部主管，他一直堅守推素的信念。「我希望將素菜的味道、賣相做得吸引一些，打破一般人認為傳統齋菜沉悶印象，吸引更多非素食者及年輕人茹素。即使一星期吃多幾頓素菜，也是好事。」



2015 年，Ken 來到台北三重區慈濟分會出席認證儀式，正式成為慈濟人。契爺陳纘強（左）也有前來支持。Ken 的法名是「惟順」，眾人祝願他在推素過程中順順利利、順心順意。



Ken 感恩媽媽一直默默支持他，二人更常常「母子檔」拍住上煮香積。

提及設計素菜的靈感，Ken 表示很多時也從非素食的朋友中獲得啟發。「平時和他們外出用膳，我特別留意他們喜歡吃些甚麼，然後如法製作素菜版本。」Ken 笑言，有朋友愛吃吉列豬扒，細問之下原來對方喜歡香脆的吉列外皮。因此他特別炮製了一道「吉列菇扒」給朋友品嚐，「他吃後問我，為何這個豬扒『淋淋地』，但又幾好味？當我告知其實這是素菜來，他才恍然大悟！」

助力：家人、朋友身體力行支持

Ken 認為，只要在調校素菜味道時花多些功夫，煮得更鮮味、惹味，不難「以假亂真」，令非素食者明白到素菜一樣可以取代肉類，甚至令他們漸漸



Ken 為擔任慈濟素食烹飪班導師，吸納了不少支持者。

愛上素食。「試過有非茹素的朋友，在我影響下，特別在結婚當天舉辦素食婚宴，教我十分感動！」

除了朋友，家人的支持亦是他的推素的原動力。「以前在家中吃飯，一半是肉類；現在幾乎全是素菜！」但原來 Ken 回家時較少拿起鑊，「媽咪才是家中大廚呢。她從小在婆婆的大牌檔幫手，下廚功夫了得。」他自言最難忘母親煮的花奶雞，「有

點像茶餐廳的白汁雞皇，但媽媽加了不同顏色的甜辣椒做配菜，看上去色彩繽紛，這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菜式。」

茹素後，Ken 決定將這道兒時難忘的菜式轉為全素版本。「我將麵筋製的白素雞取代真正雞肉，其餘配菜及製法跟足媽咪的秘方。她吃過一口後，輕描淡寫說『都 OK 啦』。」簡單一句說話，代表著母親對 Ken 的肯

定，亦鼓勵他繼續推廣素食。「當然還有契爺的支持。」Ken 當初曾一度猶豫應否做飲食業，「我起初的想法是先做幾年消防員，儲夠錢後才開素食 Cafe。」契爺卻鼓勵他，既然當初抱有開設餐廳的夢想，何不一開始便入行，從工作中實踐、學習。

阻力：曾嘗掙扎，謹記不忘 發願一念心

Ken 感恩自發願推素以來，家人、朋友給予他助力。「相反，阻力往往是來自自己。」始終飲食業這一行，人工不高、工時長，放假不定時。每天休息工作再工作，亦令 Ken 有過懷疑、掙扎的時候。但每當情緒低落，他就會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發願的一念心，還有這一句靜思語：「對的事，做就對了。」

這些年來，Ken 一直在慈濟擔任素食烹飪班導師；慈濟大大小小的素宴活動，當然少不了他這位大廚的份兒。近年他更開始「辦數多多」，

例如跟佛門網體驗頻道拍攝《素食教煮》烹飪節目、與出版社合作推出素食食譜、為傳媒撰寫素食專欄、前往不同的學校及機構分享素食心得……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更多人體驗素食的好處。「其實大家都明白多吃素菜有助健康，只不過不想餐餐如是。我相信，只要從烹調方面入手，煮出令人不覺沉悶的素食，自然能吸引更多人『轉素』。」

證嚴上人在著作《年年三好三願》中，誠願大眾「身行好事」，因為眾生皆有佛性，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能做到茹素戒殺。Ken 師兄發願以來，一直身體力行實踐，自利利他。這就是上人所說的對事和好事。❀



「沛然的體重達 1.9 公斤時，醫生說她可以回家休養了。」李太說。

沛然是早產兒，在媽媽胎裏才二十六周就迫不及待出世了，出生時體重不及兩磅。李太回想。「當天在產房裏，丈夫一直問：為甚麼會這樣？這麼早出世能生存嗎？我也顧不上他，自己心煩意亂，還要忍受陣痛，一邊吸著止痛藥，一邊念觀音菩薩。」

沛然五臟六腑未長全，醫生建議先給她注射兩支強肺針，兩支針需要間隔十二小時。第一支針打過以後，陣痛越來越強烈，分秒難熬，連觀音聖號也念不下去了。李太便跟女兒說：既然你選擇這個時候來到世界，就要順利出世。

當時，產房內有很多醫生、護士，只見他們忙著搶救孩子，卻看不到她，也聽不見她哭。她內心旋即後悔起來，後悔自己撐不到第二支針，萬一女兒救不活怎辦？

院侍去探望李生、李太時，深深感受到他們的焦慮不安，從旁陪伴和支持：「繼續保持正面心態，祈請菩薩加被，祝福小孩平安。」

兩夫妻一直很希望有小孩，李太懷孕之前、之後，天天誦地藏經。她對佛菩薩的信心始終如一，沒有半點動搖。無論行、住、坐、臥，她都念著觀



音菩薩，在孩子身邊也念給她聽，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她，她也不理，深信孩子會大步檻過。

每天探病時間未到，李太已在門外等著，探病時間過了，她還捨不得離開，恨不得能二十四小時陪伴在側。丈夫下班後一定趕來給女兒打氣，回家後又上網購買孩子的衣服和用品。女兒提早到來，一切還未準備好呢。

離開母胎，沛然住進了深切治療部的保溫箱九十天。迎向她的，是一關又一關的考驗——黃疸過高要「照燈」，腦出血二至三期要治療，醫生又懷疑她有腦膜炎，兩度抽取骨髓去化驗，加上心臟

導管生長不健全，需要接受手術。每次簽字，李生、李太都心如刀割，卻也無可奈何。

粗大的氧氣管輕輕架在她的臉和鼻孔上，奶汁需靠胃管輸入，還要面對消化不良、細菌感染、痰塞的煎熬。起初的一個月，沛然的體重提升緩慢，也聽不到她的哭聲。

「做心臟手術前，我忍著淚對她說：你一定要勇敢，一定要堅強，爸媽在門口等你，你一定要平安出來。她好像聽見了，第一次『哇』地哭了幾聲。」李太說著，眼都濕了。

整整三個月，兩夫妻從無法接受到願意面對現實，不再浪費時間傷心難過，開始積極學習照顧女兒的方法。

「第一次伸手入保溫箱替她換尿片，我手腳笨拙，弄得一床的糞便。首次餵奶時，用了一個半小時，深怕噎到她，又怕她沒有呼吸。」

李太繼續說：「她像個小戰士，有特強的生命力，教我們不輕言放棄。」

佛門網致力弘法利生的志業，營運經費有賴各界人士慷慨捐助。您的捐助能幫助佛門網為讀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內容，利益眾生。《一門超出》由佛門網出版，弘揚正信佛法，免費結緣。

助 印 表 格

我願意助印《一門超出》

捐款方式

附上劃線支票共港幣 \$ _____

支票號碼：_____

抬頭：佛門網有限公司

捐款人資料

姓 名：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只需填寫頭 4 個數字）
日間聯絡電話：_____
電郵地址：_____
通訊地址：_____

為了讓捐款人了解佛門網的最新動向，我們將使用閣下提供的資料，向您寄送本刊物、收據及活動消息。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如您不欲收取資訊，請在下面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我不欲收取佛門網資訊

～阿彌陀佛～

請將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至：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6 室
「佛門網」收

護 持 佛 門 網

【佛門網】是一個內容豐富、規模龐大的佛教網站平台，努力為全球不同地區華文讀者提供正信佛教的資訊。我們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促進漢文佛教經典的現代詮釋，期於義理、修行和在世應用上提供有用參考。佛門網特別致力服務未能聞法、難以聞法者，例如殘障、地處偏遠、貧困、被歧視和弱勢等人士。佛門網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日常營運需要大家支持。閣下的捐款，將用於佛門網各項弘法工作，感恩各位！

請立即到以下網址填寫捐款資料，登記成為**每月捐款者**！

<https://donation.buddhistdoor.org/tc/form/monthly>





郵
票
位
置

新界荃灣白田壩街 5-21 號
嘉力工業中心 A 座 9 樓 5-6 室
佛門網有限公司



派發地點

廣告查詢：(852) 2405 6328 / enquiry@buddhistdoor.com

串門子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
龍水街13巷9號一樓

無事生活
台灣台北市信義區
吳興街461號

台北



淨慧
The Zen Center of America
香港元朗雙連路17號
順發樓三樓P-G室

一素店
元朗圓福路2-6號
交細廣為地下1號舖

大覺 福行中心
大覺福行中心
香港九龍長沙灣長義街10號
昌隆工業大廈12樓A1室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
馮景禧樓204室

東蓮覺苑雲來集
東蓮覺苑雲來集
香港葵興祥利街9號
祥利工業大廈23樓

東蓮覺苑
TUNG LIN KOK YUEN
東蓮覺苑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15號

Harvester 養
Harvester
上環新街市街
德利商業大廈A-B舖

中大覺學中心
中大覺學中心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
賽馬會教學樓4樓415室





出版：



佛門網
buddhistdoor